

那天晚上有个朋友间的聚会,下午兴安发来微信:晚上来吗?我说来。他说:给你带我的新书。我说:别写错我的名字,你总错。他马上发来毛笔字写的扉页:鬣眉好友雅正。随后说:咋会写错呢?是的,现在一点也没错,但是之前他总错。前一段时间我搬家整理旧物,有很多老朋友的书信翻了出来,其中夹杂着兴安写的一个《北京文学》稿签,就是当年他送审我稿子时的审读意见表。那个稿签,他把我的名字中间的“鬣”写成了“黎”,以后大致都是如此。如今他不认,并说那天是在我微信提示之前他已经写好了扉页的签名,有图有真相,这个应该点赞。

我跟兴安相识时大家都二十岁出头。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他分配到北京市文联所属的《北京文学》杂志社,我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编辑部。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火热的时代,而年轻的我们正是跟着这个时代且行且前进的,或者说我们是当代文学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亲历者都不为过。因为我们都是一线的年轻的文学编辑,而我们俩的父辈又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骨干力量:他父亲特·赛音巴雅尔,曾任《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我父亲程树榛,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我们两家的父母都住在同一幢楼里。两代人都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变革和90年代的文学辉煌。

时间退回到1986年,中国作协在北京举行全国

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丰台宾馆,我作为年轻的编辑,被《青年文学》派去驻会,主要目的是联络作者和组稿。那次会上认识了许多北京的年轻作家,除了《北京文学》的兴安,还有同样年轻的陈染,恰巧我跟陈染同屋,晚上临睡前我们还聊了一会儿三毛的散文,那时我们真年轻。那次会议热烈、活泼、开放,每天开完会,晚上都有舞会,先是交谊舞,然后以迪斯科结束。

那时刘索拉刚刚发表小说《你别无选择》,这部小说就像一颗炸弹,惊得文坛狼烟四起。刘索拉自然就成了那次会议的风云人物,走到哪儿后面都呼啦啦跟着一群人,我终于明白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崇拜是什么样子,那样子也动人,因为大家真诚不设防。而刘索拉真真实实地展现了北京“大飒蜜”的做派,她高挑,漂亮,潇洒,闪闪发亮,这个集才华与颜值于一身的孩子,用现在的话说像是一个女汉子,说话又爽又脆。舞会上兴安特别活跃,有蒙古族孩子的浑然天性,能歌善舞。记得兴安邀请刘索拉跳舞时,她指着我说,你应该去找小姑娘跳,那时在她眼里我们都是小孩子。

兴安是“社牛”,年轻时代就活跃、洒脱、不吝。我们那个年代的编辑都有作家梦,我在编杂志的业余时间写散文,他也写了不少东西,但是他更突出的是对于作家作品的整体性和类型化的思考,以及一些文学主张,譬如他在《北京文学》任职期间参与



上海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掠影 (布面油画) 金国明

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90年代中期任副主编之后更是编辑了很多“新生代”“新体验”“新女性”“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代表作”等文丛,在当时很有影响。突然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兴安主编的。他那时致力做女性散文集,很敏锐,聪明,动作快。我的这本散文集原本是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准备的,被他中间“截胡”。那套女作家散文丛书他取名“金苹果新女性散文系列”,其中有作家林白、杜丽等,那个时候我和林白、杜丽过甚亲密,跟好朋友在一起出书,是开心的事情。兴安在序中写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用‘爆炸’这个词来描述,恐怕不为过……这是个人才辈出、群芳争艳的时代。中国的女性作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众多的群落和高质量的作品……”“在这众多的女性群体里,有一批更为年轻的散文或随笔写作者,她们是冯秋子、于君、杜丽、程霖眉……以及诗人林白、陈染等。她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因此有人将其与同辈的男性作家混称为‘新生代’,而我则更希望称为‘新女性’……”

我找出这本书,看到兴安的序言,落款是1995年的圣诞节,近三十年前,年轻的兴安文字充满了激情、文采和洞察力。回想那个90年代,文学几乎是

一个时代的狂欢,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兴安在《北京文学》,我在《青年文学》,见证了这些作家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我责编的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百花奖”以及很多杂志和省市级政府大奖。作为实力派编辑的兴安,在这方面应该贡献更多,他与许多当代著名作家都交往颇深,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写张洁的文字以及评论张洁的油画,很有感染力,都具有史料价值。我父亲说兴安的父亲组织和活动能力非常强,看来能力是会遗传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兴安已经从一个作家、评论家、编辑家,过渡到一个画家。这些年从他微信的信息看到,他忽而在国内办画展,忽而出书。他的水墨艺术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内外机构和画廊收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老爸爸于蓝有知一定很欣慰。他说在他父亲内蒙古师大的纪念馆里,有我父亲写的对联,我说希望有机会我去参观,老一代作家让我心怀敬畏。突然想起在潘家园的作家协会那幢宿舍楼,我父母家和他父母家住楼上楼下,我经常看见我爸爸与他爸爸还有楼里的作家们,在楼下花坛前面谈笑风生……兴安现在似乎越活越年轻了,更加舒展和松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常去兆丰别墅看望姨公王个簪。

姨公那时70多岁了,一头银丝,精力很充沛,每日上午晨练回家作画,午餐后稍作休息,下午大多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在我心目中,姨公是个大人物,他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他是全国政协三、四、五届委员;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第一副院长、名誉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员,西泠印社社长,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姨公平易近人,讲话诙谐,平时喜欢和熟悉的朋友聊天。即使与我这样的晚辈谈诗论画,他也没有长幼之别,使我如沐春风,得益多多。

姨公对我说,他生于江苏海门一个教师家庭。他自幼攻《诗经》、练书法和篆刻,在南通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1919年在南通城北小学任教时结识吴昌硕的门生李苦李。1920年结识吴昌硕的大弟子陈师曾。次年结识吴昌硕的挚友诸宗元,由诸宗元把王个簪早年所刻印稿四大本,带给吴昌硕批注点评。

1923年8月在李苦李的引荐下,姨公见到了吴昌硕。当年他27岁,毅然辞去南通省立第七中学国文教师的工作,赴沪拜入吴门,兼任吴昌硕弟子吴长邺的家庭启蒙教师,从此有机会日夜陪伴在吴昌硕身边。在吴昌硕晚年的日子里,姨公朝夕侍师,聆听教诲,勤学苦练,诗书画印衣钵尽传。文艺界普遍认为吴昌硕有三高足:第一陈师曾、第二潘天寿、第三王个簪。他们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一代名家,王个簪与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交往频繁,留下不少轶闻趣事。

1931年,他在吴昌硕的老友曾农髯家中结识了曾老的得意门生张大千,两人结为过交,志趣爱好、性格脾气都很接近,朝夕过从,切磋艺事,亲如兄弟。王个簪比张大千年长两岁,有一次与曾老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像他新书的名字《天性如此》。我发现其他人的身上有很多老派文人的作风,比如他只听黑胶唱片,必须是古典音乐;他弹钢琴,画画,写字,精力充沛,随心所欲。去年我为一家出版社主编一部散文年选,他的散文《少年的沼泽》很打动我,题目我就很喜欢,很有灵性,我们都出生于东北,对于少年的天地自有一番怀想。

他的新书《天性如此》我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书集合了他的书画和文字,他的文字随性自如;他

合影,王个簪风趣地对张大千说:“你胡子这么长,理宜居中。”张大千说:“你是兄长,怎能站在旁边?”这才拍下珍贵的合影。

张大千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谈到“荷菱梅兰,吾仰碧曼青、王个簪。”并在画册上亲笔题词寄赠王个簪。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病逝于台湾,王个簪时年87岁,哀痛之际写了两首悼诗,以抒怀念之情。

徐悲鸿比王个簪略长,他们相识是在王一手家。当时徐悲鸿从法国回来,去拜访王一手,王一手

现场展读了徐悲鸿随身带去的两幅画,其中一幅还没有完成,王一手当场欣笔补成。王个簪、王一手、徐悲鸿三人艺趣相投,相交甚笃。

徐悲鸿回北京后,曾来信邀请王个簪去北京艺术学院任教,王个簪由于已在上海执教及其他原因,未能前往。1953年4月,王个簪收到徐悲鸿寄来的一张照片,是他和夫人廖静文与齐白石及其家人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1952年12月,罗铭兄为白石翁摄影于其北京跨车胡同寓中,时其全家及友人访之。即赠:个簪先生纪念。弟:悲鸿,1953年4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个簪的艺术进入全盛时期,作品参加历届全国美展和上海美展。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4年上海美术家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

1957年春,上海美协在沪举办“王个簪书画展”。6月应北京美协邀请,“王个簪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其间王个簪前往拜访95岁高龄的齐白石。白石老人身穿长袍,手执羽扇,耳聪目明,神采巍峨。他在画室会见王个簪一行,交谈达一个多小时。同年,齐白石逝世。王个簪代表上海文艺界赴京与周总理、郭沫若等一起参加齐白石追悼会,沉痛缅怀一代宗师。

与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这些师友一样,王个簪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笃重情感,热心为公。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那天晚上聊到大学刚刚毕业时,我们一起参加文学界活动的事:三十多年前,舞台上,兴安带着女朋友,在舞厅里转呀转。后来我们一起去唐山,参加河北作家关仁山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印象深刻的是他发高烧在酒店休息,听说我们去卡拉OK,二话不说起身就和我们一起去唱歌,拼命上台唱了一首《糊涂的爱》,我们都为他捏把汗,神奇的是,他唱了一身大汗后,高烧居然退了,病立马好了。回来后他们寄给我几张照片,是兴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晓,我们仨没心没肺地笑闹的样子,那时大家恰风华正茂时,尚不识人间沧桑。

犹记得从唐山回北京是绿皮火车,很慢,咿咿呀呀,一站又一站,为了打发时间,兴安说玩个游戏吧!他背对着我,让我把一只手高高举起来,过几秒钟再放下,他转过身,查看我的双手,马上能猜出我举起的是哪只手,傍晚的火车窗上反照出王晓的坏笑。现在想起来,这个游戏很傻,但是很天真。



重阳述怀

披风野径游, 九天龙共住, 采菊赏清秋, 三径鹿同修。 昔好闲中笑, 相闻美心底, 今为喜里眸, 踏歌登上楼。

中国邮政于1976年4月9日发行了一组“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主题邮票。每次看到其中“针刺麻醉”这枚邮票时,回忆就不自觉地扑面而来,我们仁济医院中医科主任秦亮甫教授跟我们讲述他当时参加全国第一例针刺下心内直视手术经历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针刺麻醉始于上海。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采用针刺双侧合谷穴的方法,完成了未使用麻醉药物的扁桃体摘除手术,创立了针刺麻醉新领域;1960年,上海肺科医院成功完成了首例针刺麻醉肺切除术;1972年,上海仁济医院成功完成了首例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内直视手术,这也标志着针刺麻醉可以应用于大型手术,将针刺麻醉技术和适用病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发表的文章介绍了美国记者在北京采用针灸疗法治疗阑尾炎术后腹痛腹胀的经历,引起了国际上对针灸疗法的兴趣。1972年,在针刺麻醉下进行了甲状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从而

在国际社会掀起一股针灸热潮。此后,全国各地的记者以及美、英、法等国的医学代表团,相继到仁济观摩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内直视手术。

针刺麻醉始创于1958年,后经推广,有90余种手术可采用此法,唯独体外循环内直视手术成了针麻的禁区。1970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提出:“针麻要超越体外循环这一禁区。”当时的仁济医院当

仁不让地挑起了重担。王一山、冯卓荣等西医专家领衔,联合中医科秦亮甫、麻醉科孙大金组成针麻小组,开始探究适用于心脏手术的针麻有效穴位。施行针麻手术对手术团队的要求很高,需要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之间通力配合。

王一山教授回忆:“接受第一例手术的患者是15岁的孙美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如果不及时救治,她可能活不过20岁。”

秦亮甫教授回忆:“当时我们这一队人马,齐心协力,整个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天早上8时,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秦亮甫开始为孙美新的耳、腕、颈部选取六位针扎,边扎针边轻轻询问:“痛吗?”同时观察她的反应。“不痛,但是很酸。”躺在无影灯下的孙美新很平静。8根小银针上身,连接上针麻仪后,并通电刺激,随着针麻仪的微微震动,小美新产生了一种酸、胀、麻、重的感觉。9时35分,手术正式开始,王一山和冯卓荣在病人的胸部划出30厘米左右的切口,叶春秀同时施术暴露股动脉,为体外循环做准备。10时,胸骨被切开,拉钩撑开胸腔,孙美新听着电锯声,神志清楚,能睁眼讲话,不皱眉,不喊痛。经过三个多小时,手术完成,孙美新成为第一位接受针刺麻醉下体外循环内直视法洛氏三联症修补矫正术的患者,这是中

主题邮票与秦亮甫教授

李鹤
秦亮甫教授回忆:“当时我们这一队人马,齐心协力,整个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天早上8时,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秦亮甫开始为孙美新的耳、腕、颈部选取六位针扎,边扎针边轻轻询问:“痛吗?”同时观察她的反应。“不痛,但是很酸。”躺在无影灯下的孙美新很平静。8根小银针上身,连接上针麻仪后,并通电刺激,随着针麻仪的微微震动,小美新产生了一种酸、胀、麻、重的感觉。9时35分,手术正式开始,王一山和冯卓荣在病人的胸部划出30厘米左右的切口,叶春秀同时施术暴露股动脉,为体外循环做准备。10时,胸骨被切开,拉钩撑开胸腔,孙美新听着电锯声,神志清楚,能睁眼讲话,不皱眉,不喊痛。经过三个多小时,手术完成,孙美新成为第一位接受针刺麻醉下体外循环内直视法洛氏三联症修补矫正术的患者,这是中

他们为家庭圆梦,助数百万疑难患者当上母亲。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仁济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